

新视觉书坊

和文学大家

吴泰昌 著
学林出版社

HE WEN XUE DA JIA

和文学大家

新视觉书坊

主编 肖关鸿 曹维劲

吴泰昌 著

学林出版社

HE WEN XUE DA JI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文学大家 / 吴泰昌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4
(新视觉书坊)

ISBN 978-7-80730-773-0

I. 和… II. 吴… III. 作家—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1899 号



和文学大家

作 者—— 吴泰昌

责任编辑—— 许钧伟

装帧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1 万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0-773-0/I·132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关于新视觉书坊

当印刷机把每年十几万种图书排山倒海似地推向读者的时候，我们希望这套小小的丛书给读者面貌一新的感觉。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或是在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里发现一个新的亮点，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

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有阅读上的冲击力，能够吸引各个层面的读者，给读者的视觉和想象提供更大的空间。

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床边占一席之地。在文化快餐化的年代，能够为文化积累添一块砖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主编

2000年8月

目 录

第一辑 和文学大家	1
钱杏邨与《二心集》	2
阿英的最后十年	8
一次突然的消失	16
作家的可贵友谊	20
孙犁是这样回答的	25
夏衍谈报告文学	34
巴金这个人	40
听朱光潜老师闲谈	50
紧含眼中的泪	62
秋天里的钱钟书	70
冰心：“我爱的书”	77
周扬书橱中的一本书	82
朴老在我心中	87
断忆白尘	91
含笑的艾青	98
“学昭同志”	106
走进叶家大院	113
拜见张恨水先生	121
盛会之际忆茅公	124
跟光年同志学做编辑	132
听孙犁长谈前后	136
陪巴老的两度杭州之旅	144
情深意切的臧克家	153
听李健吾谈《围城》	159

忆柯灵	165
第二辑 艺文轶话	171
《女神》的修改本	172
蒋光慈的原名、改名及其他	176
郁达夫与太阳社	180
齐燕铭遗札	184
关于《红楼梦戏曲集》	187
从郑振铎、叶圣陶没有参加“左联”谈起	195
叶灵凤与麦绥莱勒木刻连环故事集	198
《怀旧》的雪泥鸿爪	201
文学研究会宣言的起草者	203
包天笑与鸳鸯蝴蝶派	206
当年的《赛金花》	209
孙中山的诗作与诗论	212
引进西方艺术的第一人——李叔同	214
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马君武	220
一氓老的雅趣	225
吴组缃的《山洪》	234
后记	238

《秉心二》已映杏封

第一辑

和文学大家

HE WENXUE DAJIA

钱杏邨与《二心集》

《二心集》是鲁迅心爱的一本杂文集。他曾经说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①可能也正因为这点，致使它的出版，几经周折，这对鲁迅来说，却是仅有的。

《二心集》于1932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初版刊行。鲁迅在此之前的几本杂文集，除了《坟》，都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为什么这本在他看来是“比较好一点”的集子，却偏偏交给了开张不久的合众书店呢？

钱杏邨在4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最早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以鹰隼的笔名写的《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②一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是只认得盈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后来几经交涉，总算书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于1932年出版了。

这段话，说明钱杏邨是《二心集》出版的媒介人，原稿是由他转交合众书店的。

1957年12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五版上发表了王知伊的《最近发现的一封鲁迅书简——有关〈二心集〉改名出版的珍贵史料》一文，为我们进一步提供了情况。该文第一次公布了鲁迅1934年10月13日给合众书店的信^③，同时还公布了钱杏邨1932

① 《致肖军、肖红》（1935年4月23日）。

② 此文原载1938年6月9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后收入著者《剑腥集》，1939年上海风雨书屋初版。

③ 作者误为1933年10月13日。这封信现已收入新版《鲁迅书信集》。

正啟者，得 惠函，要將刪修之《二心集》以
 名出版，以此出版權之作者，自宜異議。但
 我要求在為一石上，聲明此書係中央國
 書館查會審定刪存，仍於廣告。上須
 說去是《二心集》之一部，不創，亦混漢
 者之責任。出版者如作者都不負責，我
 是要設法自己告白的。此致
 合眾書店台鑒
 魯迅
 有啟

鲁迅关于《二
 心集》给合众
 书店的信函

年8月22日代鲁迅领取《二心集》版权费收据笔迹，全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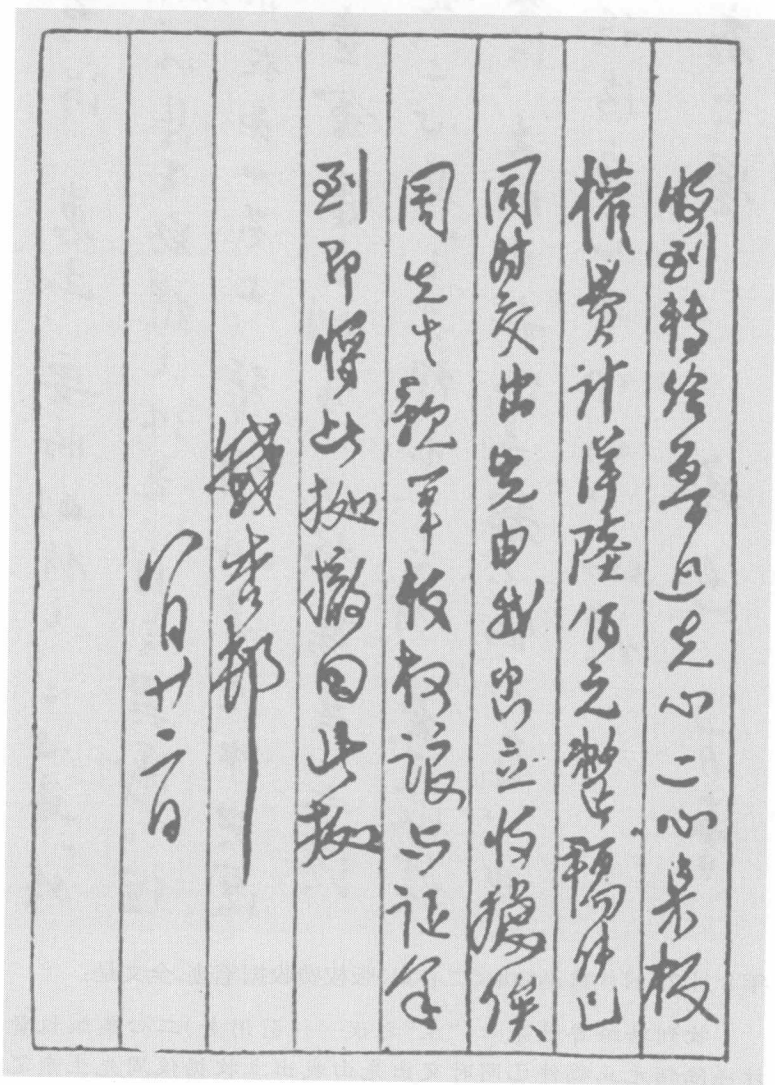
收到转给鲁迅先心（“生”之误——引用者）二心集版权费
 计洋陆佰元正稿件已同时交出先由我出立收据俟周先生亲笔

版权让与证拿到即将此据撤回此据

钱杏邨八月廿二日

这张收据,使我们知道,钱杏邨在奔走出版《二心集》的过程中,与鲁迅有过接触。

翻阅《鲁迅日记》,没有发现多少与此相照应的记载。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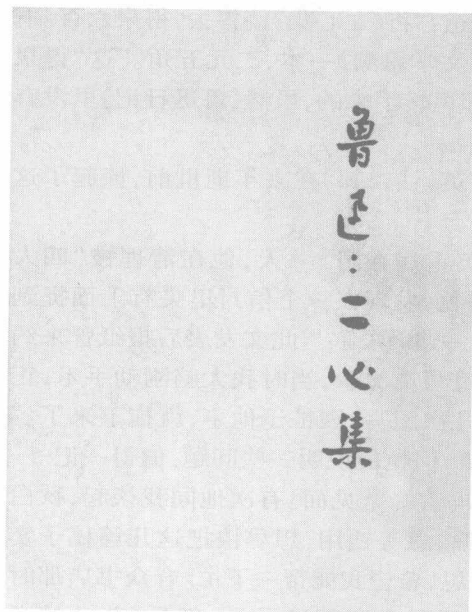
钱杏邨代领鲁迅《二心集》稿酬的收据

1932年8月23日日记记道：“将《二心集》稿售去，得泉六百。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露西亚文学思潮》一本，二元五角。”这“得泉六百”，无疑是从钱杏邨那里转手来的，虽然《鲁迅日记》里没有明说。

有幸的是，当事人阿英（钱杏邨）在去年逝世前，谈起了这件往事。

1976年冬天，时阿英重病在身。一天，他在清理被“四人帮”抢走退回来的文稿信札，发现在一个信封里夹有上面提到的那张收据剪报，他看了一遍，说道：“此文发表后报纸曾来约我就《二心集》的出版经过写篇文章，当时我大脑刚动手术，正在休养，未能动笔。后来几次想写，因忙于他事，就拖下来了。”虽然这是很细末的一件事，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值得一记。

他说，1932年，我和冯雪峰常见面。有次他同我谈起，秋白翻译了高尔基的几个短篇，急等钱用，想尽快把这几篇稿子卖出去。他和鲁迅先生的意思，希望我能帮一下忙。合众书店那时刚创办，急需买稿，他们要了我两部稿子，一部是《劳动的音乐》，是翻译高尔基的小说；另一部是《现代中国文学论》。我同书店熟，他们也托我找稿子。我答应去同合众老板谈。但书店对此译稿不是很感兴趣。当然我没有向他们透露这是秋白的译著。我将合众的态度告诉了雪峰，雪峰不久对我说，就这样吧，鲁迅答应将《二心集》给他们，条件是要将译稿一道买下。他还说，《二心集》原是给北新的，他们看后不准备出，鲁迅很生气。鲁迅的意思，合众如要，就干脆把版权卖掉，他也正缺钱用。这样雪峰就将这两部原稿交给了我。我及时带给书店，他们一眼看上了《二心集》，很高兴地买下，稿酬也优厚，千字六元。至于译稿，他们说还需要再考虑考虑。为此，我同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当面谈过，鲁迅叫我转告书店，必须同时买下译稿，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最后书店才勉强抽买了其中《不平常的故事》一篇，出千字三元的稿酬。我为《二心集》的出版，记得同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有过二、三次接触。《二心集》的版税是鲁迅委托我代领的，我将钱交给他时，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知道那里面有说到你的地方。我明知《二心集》里有的文章涉及到我。因为在筹备“左联”的初期，我同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同



1932年合众书店出版的鲁迅
《二心集》封面

志,就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曾当面向鲁迅先生承认过我们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鲁迅先生也说了一些团结的话。此后,在和鲁迅先生往来时,彼此都再没有提起过这些。现在他这么说,虽然是亲切的,开玩笑似的,却使我感到很突然,不知说什么好,只笑了笑。这个情景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那么清晰。鲁迅答应由他正式出一张收据,把我代写的抽回,后来不知道他写了没有,我的那张也忘了取回。合众书店政治上对我们还是好的,只是经济上考虑多一点。他们对《二心集》出版是相当重视的,宣传广告写得不错^①,记得广告刊出前书店曾给我看过。《二心集》出书不久,即遭国民党政府查禁^②。我的两本书亦然^③。合众因此经济上很受损失。《拾零集》的出版,是1934年的事,我未经手。

① 在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论》(1933年合众书店版)附页中登有宣传《二心集》的广告:“本书是鲁迅先生1930年与1931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比他早前的作品,更尖锐,更深刻,留心鲁先生作品的,不可不读。”

② 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一九四页。

③ 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第一九四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第一四八页。

从书店那里听说，他们与鲁迅直接联系过，《拾零集》的书名好像也是与鲁迅相商过的。鲁迅 1934 年 10 月 13 日给合众书店的信，我是 1957 年从报纸上见到的。我认为，这封信是针对国民党的。根据当时上海险恶的政治环境，鲁迅清楚，书店是有可能“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鲁迅体谅书店的处境，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立此存照，这是一种巧妙的斗争艺术。书店能在封底注明“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作出某种暗示，也就很不容易了。

《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里，关于《二心集》“北新”不出，曾多次谈到；至于为什么到了“合众”，从未说明。这种奇怪的现象，使我们感到，鲁迅当年精神上所受压力的沉重，即使像他这样伟大坚强的战士，也不得不时时要提防国民党文字狱的魔影，致使他在日记、书信里，不得不回避他与党内一些同志的友谊。此仅一例。

1978 年 8 月

阿英的最后十年

阿英逝世快两年了。

这位使我尊敬的前辈,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深刻,像一刀一刀雕在我的脑壁上,又像一根一根的尖针扎在我的记忆里。十年,在林彪、“四人帮”的肆意摧残下,文艺界有多少优秀之士屈死。有的当时倒下了;有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备受折磨,终于致死。阿英就属于后一种。他长期蒙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但是,他从不呻吟,他以惊人的毅力支撑到了1977年6月17日,分享了国家新生的欢乐。

1966年初夏,阿英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所谓的十七年文艺黑线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而阿英,从20年代末起,就是我国



郭沫若抱病与夫人于立群出席阿英追悼会(1977年6月28日)

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被打成反革命的“四条汉子”，他与这些老友历史的和现实的关联，又岂能幸免祸及。他常对家里人说：以后“罢官”也好，可以有时间安下心来做些多年想做的事。他知道年龄不饶人，加上自己大脑有过疾病，66岁的人，很难说会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丧失思维和写作能力，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尽管白天挨斗，挂牌子示众，晚上他总是在认真地回忆、检查自己。他希望运动赶快过去。

但是，他想得太天真了。一场罗织罪名的残酷迫害，没头没脑地打在他的身上。

1967年2月2日下半夜，他被抓上一辆大卡车，从家里被绑架走了。原来上半夜，江青在接见电影界的一次会上，公开诬陷他是“叛徒”。当时的江青是上帝的化身，她的话就是法律。她说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谁若不同意，谁就是反对中央首长，就是现行反革命。阿英用沉默来对抗，自然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

三天后，江青伙同康生，又在一次电影界座谈会上，诬蔑阿英作为顾问的影片《诗人杜甫》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说影片里表现了阿英等人的“阴暗心理”。1970年，在姚文元把持下的第六期《红旗》上，一篇署名钟岸的攻击陈白尘的话剧《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中，又诬蔑阿英1941年愤慨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而创作的历史剧《洪宣娇》，是“反动文艺作品”，是用“指桑骂槐”的手法“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样的蓄意陷害，简直要把阿英置之死地。1945年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他在苏北根据地创作的优秀剧作《李闯王》，竟也成为“借古讽今”、影射攻击的“大毒草”。1962年《文学评论》发表的他写于1955年的一篇谈《老残游记》的旧稿，因为其中谈到清官与贪官问题，也被强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

从此，阿英头上被戴上了“叛徒”、“反党分子”两顶帽子。

1966年盛夏，当社会上抄家盛行时，反革命小丑戚本禹曾在一个公开场合，传达了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阿英当时还以为这是一种好意的关照。阿英的收藏素负盛名，他那小巧的独家四合院弯弯曲曲的书房，吸引过不少国内外知名的人物。陈毅同志、郭老来看过书。陈伯

达和康生也来看过书、借过书。谁知不久,陈伯达一伙的卑鄙用心就暴露了。

1968年秋天,阿英全家被从棉花胡同旧宅扫地出门,赶到终年不见阳光的一间过道南屋。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解放后,阿英曾陆续捐献给国家相当数量的珍贵图书。现在残存的两张文化部文管局签发的阿英捐赠书单记载着:1954年12月16日一次捐献明版本书7册;1956年一次捐献明、清善本书75册。1968年,他尚在受审查,曾主动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在他被封存的图书中,有可供研究中苏边界问题用的资料。“四人帮”一伙如此无视社会主义法制,以强权抢夺别人的私有财物,而这种强盗行径,竟然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使阿英极为痛心,极为震惊。如果说,江青在政治上对他的诬陷是给他精神上插了一刀,那么这件事,也同样是很深的一刀。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健康很快恶化了。

1969年,阿英中风了,瘫痪在床,失去了说话能力。在缺乏起码的医疗和物质条件的情况下,靠爱人林莉同志的照护和梅



在接受中央专
组审查时的阿
英(1975年春)

兰芳夫人福芝芳等亲友接济药物,总算慢慢缓了过来,八、九个月后又逐渐恢复了说话、写字、走路的能力。但日子越来越艰难,老伴受株连被迫退职,精神分裂症加剧(在阿英逝世不到两个月也相继故去)。唯一一直生活在身边的幼女,大学毕业后,因系“叛徒子女”,不能留京照顾两位重病的老人,被分配到河北省农村工作。大病初愈后的阿英常常拄着拐棍,边走边歇,上街买东西。

1975年秋,喜事和悲剧对阿英交相冲击。由于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着手解决了一批老干部的问题;加上陈毅同志生前的过问和关怀,他的问题解决了。江青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中央恢复了这位老党员的政治名誉。他虽仍处斗室之中,对国家的命运深感忧虑,但他坚信中国的光明前途。那年他已是75岁高龄的人了,为党工作的希望又在他心里萌动,他打算一旦被抄走的资料退回,就闭门工作。谁知,当他刚卸下政治的镣铐,病魔又紧紧缠住了他。9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秋雨连绵的早晨,医院宣布他肺癌已至晚期,至多只能维持几个月。这对家里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对自己的病情毫无觉察,不知道他的生命在以日计算。他初住院时还乐观地说:春天以后,会好起来,有很多事要做。

阿英顽强的生命力一度使家人和朋友对他的健康抱有希望。1957年,他因脑血肿,动过一次大手术。当时几乎被判定不得获救,即使幸存,也会落个不能做文字工作的后遗症。万幸的是,他及时得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亲切关怀,手术很顺利。经过三、四年的养息,他的健康恢复了。阿英曾开玩笑地说:我的脑子像钟表擦了一次油,更灵活更好使了。的确如此,自1961年起,短短的二、三年,他接手的工作任务一个又一个,同时又抽空写了不少文章,编写出版了好几部书。他的精力之旺盛是惊人的。

但是,残酷的现实破灭了亲友的希望。这十年阿英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太深了。虽然“四人帮”粉碎后,医疗条件大有改善,也终于不能挽回其病情的日趋恶化。首都医院的专家们说:要不是癌症,他还会活好多年的,他的心脏很好。

阿英最后十年的遭遇是林彪、“四人帮”野蛮迫害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例。这个悲剧,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

1977年6月28日,郭沫若抱病参加阿英追悼会,归途中,